

青
海
黨
史
資
料
述
輯

第一輯



贵县党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共贵县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
一九八三年四月

前　　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贵县开展革命活动，时间较早，历时较长，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起，直至解放。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中，革命前辈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建党建团，开展群众运动，建立人民武装，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挫折，才能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全贵县。

在那峥嵘岁月里，中共广西省级代表会曾有两次在贵县召开；三十年代初，贵县曾是中共广西特委机关所在地；抗日战争时期，贵县香江起义是桂东南武装起义的组成部分，曾建立过抗日民主政府；解放战争时期，贵县曾组织起三支游击队，战斗在郁江南北。在长期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党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二百多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了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歌颂前辈的英雄业绩，我办公室同志从已征集到的史料中，整理编写了部份革命烈士传略、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简介，作为第一辑付印，供县内各级党、团组织、机关、学校学习地方党史的参考。

由于编印时间仓促，难免有某些错漏，请读者特别是革命老同志、知情的父老和区内外有关党史工作同志，发现时提出指正！

中共贵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重 点 烈 士

- 谭寿林烈士传略 韦德雄 (1)
陈勉恕烈士传略 廖怀稳 (19)
董铨汉烈士传略 草壁轩 (27)
黄 彰烈士战斗的片断 徐如璋 (31)
杨威汉 (千山) 烈士传略 莫俊健 (45)
李秀农烈士传略 草壁轩 (47)
中共贵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陈培仁烈士
..... 邓锡立 (50)

重 要 会 议

- 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 鲁 坚 (57)
中共广西省“三大”会议简介 莫俊健 (61)

重 大 事 件

- 石卡区农运事件 草壁轩 (65)
覃塘排厚村事件 邓锡立 (70)
东南洋三乡事件 韦德雄 (74)
附城第八村事件 邓锡立 (80)
桂东南武装起义在贵县简介 徐如璋 (84)

谭寿林烈士传略

韦德雄

谭寿林同志，号祝封，一八九六年生于贵县桥坪三塘乡谭岭村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开始读书，中间曾多次失学。一九一六年秋考入贵县中学（四年制），一九二〇年秋毕业。一九二一年春，到上海补习，同年八月考入北京大学读预科，两年后，考入文学系。他在北大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由黄日葵、陈居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秋离开北大，专事革命工作。次年秋奉调到南方，冬季受党指派到梧州任党委书记。其后曾任地委书记、特委书记。二六年冬在梧州被捕，由于党组织营救，转解广州释放。一九二八年到上海，担任全国海员工会



谭寿林烈士

秘书长，一九三一年调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同年四月廿二日，由于叛徒黄大霖的出卖在上海被捕，五月三十日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热情如火吼如雷，俘虏生还气不墜。
恨病折磨难杀敌，回家探问亦招灾。
穗城喋血乌云墮，沪渎逢春旧雨来。
两卷遗编容我读，怅然怀念惜英才。

这是董必武同志为一九六二年重版的谭寿林烈士遗著《俘虏的生还》一书的题诗。这首感情深沉的诗篇，不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寿林烈士战斗精神与英雄业绩的颂歌，而且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革命英才的深切怀念。

品学兼优 勤劳朴素

谭寿林同志自幼好学，才思敏捷。私塾老师出对头，他很快就能对上，而且对得工整。他的作文很好，经常得到学监^①的鼓励和赞扬，赞赏他的文章气概不凡，将来一定是个有作为、有出息的人。

寿林入贵中后，学习更加勤奋认真，经常到老师房间请教，因此，他的作文更加出色，老师常拿它“贴堂”，给同学做示范。在贵县中学的四年间，寿林有七个学期成绩榜列第一，只有一个学期第二。由于他聪明能干，同学都称他为“谭督军”（意指在同学中很有威望的人）。

寿林自幼勤劳朴素，经常帮家里补衣、补鞋、钉鞋底。上中学要步行几十里路，都是自己挑行李，每期还得挑几趟

膳米。他用的是农家大小木盆，穿用的是黑芝麻衣服，黄麻蚊帐，不改农民子弟本色。假期和失学在家时，他承担干车缝衣服活，车得又快又好。

寿林品学兼优，为人和善，处事公平，因此在师生中很有威信。初入学时少数曾轻蔑讥笑他为“村巴佬”的城镇同学，不久也改为对他钦佩敬服了。一九一九年，学校选派他去梧州参加“广西省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

寿林青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耳闻目睹那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横行乡里，搜刮民膏的罪恶行径，在他的心灵上早就埋下了对反动势力憎恨的火种，萌发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抗性格。有一次，六湖村地主带着恶狗到谭岭村收租。地主的狗咬死了贫农九爷的狗，地主不但不赔礼认错，反而夸耀他的狗厉害，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寿林见了非常气愤，便和九爷的孙子抬着死狗到地主家门说理，地主被前来围观者舆论谴责，才给狗主赎回了钱。

清末的乡级统治机关叫公局，局董老爷就是当地的“土皇帝”。

少年的寿林曾在三塘公局门口偷偷地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公（供）肥三只狗，

局（局）瘦一团人。②

这副对联，巧妙地利用谐音，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豪绅和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这些家伙极为恼怒，但又无计可施。

又有一次，寿林看见桥圩公局门口贴着：“公是公非行正道，局中局外结同心”的对联，他便用毛笔在上下联第三

字右边各点了一点，变成了“公是公，非行正道；局中局，外结同心”。使这副美化封建统治机关的对联，变成了揭露反动政权，号召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标语。

寿林自幼不信鬼神，更看透那些利用迷信盘剥民众的人的卑劣行径。他入贵中后，多次向村中父老们提出，利用祠堂庙宇为校舍或拆来改建学校，为地方多培养人材。有些人怀疑说：这样做，岂不是触犯了菩萨神仙？寿林便以十一个数字历数偶像（菩萨）的无用：“一不做声，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是无用。”说得群众口服心服，一致赞成利用寺堂庙宇来建学校。后来，群众决定拆除庆林寺，用寺屋的材料来扩充“震亚小学”校舍。不料，被寺底村土豪梁柱臣抢先把庆林寺拆掉，拿走了材料。当时恰值寿林从贵中毕业回家，见到梁柱臣如此横行霸道，便组织震亚小学的学生游行抗议，高喊“打倒梁柱臣！”等口号，揭露其破坏学校、摧残教育的罪恶，并鼓动该校负责人向县政府要求勒令梁柱臣退还材料。

寿林在贵中读书时，曾有一次戳穿迷信职业者的骗局的行动，寿林伪装眼痛，由同学扶到贵中附近一个卜者处问“吉凶”。卜者胡扯瞎猜，当然不“灵验”。寿林即和同学把他的招牌、卜书等扔在地上，并且教训他以后不要再摆档骗人了。

寿林初进中学时，正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刚完蛋，又出现张勋复辟，外国帝国主义支持各派军阀、南北分裂的局面。忧国忧民的寿林，在他的作文中反映了政治思想的转变。起初，他写的多是“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非德不交论”

一类的题材，反映了他以“功济四海”为志向，以“正人”、“君子”为楷模。后期的作文，多为“国耻当雪论”、“爱国必先合群论”等一类有具体内容和要求的文章。他已成为一个反帝爱国的先进青年。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贵县中学接到北京学生会通电，谭寿林等同学发动县城的中小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并分组在大街小巷演说。这以前，有些同学只顾埋头读书，不管国家兴亡，寿林常对这些同学说：“国之不存，家将安在？唯有希望革命成功，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国家才能独立自主，个人也才有前途。”通过启发教育，这些同学提高觉悟而投入爱国运动。贵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寿林被推选为会长。他积极领导同学开展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并主办《晨报》，进行革命宣传。有一次，商会会长蔡觐文开设的“启昌号”什货铺，偷运日本火柴五百箱抵贵。学生们检查发现后，将它全部缉回学校，轰动了县城。当天晚上，蔡觐文假意请寿林和李镇峰（学联干部）到酒楼宴饮，并拿出一百毫东银作诱饵，笼络他们，企图要回火柴，当即遭到他们拒绝。蔡觐文见未得逞，就勾结知县刘天佑出面，对学联施加压力，要学联交回火柴。寿林等几位学生代表坚决拒绝，并义正辞严地说：“这是我们学生的爱国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让日货入境，就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迫学生交还日货，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说罢，便愤然而去。

为了防止敌人使用暴力抢劫赃物，学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处理日货。他们组织了中小学师生八、九百人，把这批日本火柴全数抬出，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

过县衙门、基督教堂、商会和启昌号门口，然后运到县城对岸河边焚烧。在这一行动中，得到城厢的搬运工人和河渡船民积极支援。

二十年代初期，谭寿林在北京大学参加过反宗教同盟、民权运动等组织活动，加入了北大的马列主义小组。他在李大钊、黄日葵（广西桂平人，北大学生）等人的教育影响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夏，寿林读满文学系一年级，因革命工作需要而辍学，在北京一间女子师范任教，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由黄日葵、陈居玺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寿林曾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在北方分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搞编辑工作，经常与王尽美等同志到长辛店、丰台、唐山等工人子弟学校上课。寿林还和黄日葵等在京的广西籍师生，出版《桂光》半月刊，宣传马列主义。该刊的社论除黄日葵撰写外，多由寿林执笔写稿。他们经常把《桂光》寄发旅居各省的同乡和本省各机关团体、学校，对宣传马列主义，促进广西青年的觉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二三年七月，寿林考取北大文学系，曾返家筹学费。他刚到县城，应陈勉恕校长邀请在贵中演讲。又和陈勉恕一起到圩心街进行宣传演讲。谭寿林演讲的题目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成因”，陈勉恕演讲的题目是“何谓共产党”。参加听讲的有工人、店员、教师、学生、近郊的农民和趁圩入市的群众。他俩的精采讲演，博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共产主义最早在贵城的公开宣传，是由谭寿林开始的。

在家筹学费时，寿林得到了亲友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他说：“大家这样慷慨支持我，我十分感谢。但是，不要指望

我以后做了大官，大家能够沾光。我是绝不会去当官铲地皮的。我一心只想学成后为人群谋利益！”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同革命事业连系在一起，在斗争实践中使自己逐渐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二五年夏，他和在京、沪学习、工作的进步同乡，组织“新广西期成会”，要在刷新地方政治上有所作为。

肩负重任 奋斗不懈

大革命日益走向高潮时，党从北方调一批党员干部到南方工作。一九二五年冬，广东区委派谭寿林等同志到梧州加强领导。一九二六年一月成立中共梧州党委，由谭寿林任书记。六月，梧州党委改为地委，不久，又改为特委，均由谭寿林任书记。这样，谭寿林便成为广西最早的党的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

谭寿林同志到梧州后，就积极领导革命斗争。有一次，他到苍梧召开农民骨干会议，他拿来一碗水，放入一些硃砂，然后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要象硃砂这样把水染红！”他为了“染红”梧州，“染红”广西，使之变成“赤旗的世界”，他“全身充满烈火般的热情”，积极领导广西梧州地区的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

寿林同志在梧州，领导党团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抓住有利时机，掀起两个高潮：一是宣传马列主义的高潮。他利用当《梧州民国日报》社社长的有利条件，与该报总编辑、地委委员龙启炎等密切合作，在梧州民国日报及其付刊《冲锋》上，用政论文、诗歌、小说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

把该报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谭寿林在梧州省立二中当教师，通过讲课和社会活动，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一九二六年元月廿一日是列宁逝世两周年。寿林等同志在省立二中举办“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演说会”，从元月下旬至二月初，连续进行几个晚上，寿林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宣传了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和民族问题的政策。梧州民国日报连载了寿林的讲词，使更多的人对列宁主义有所了解。

二是掀起援助省港大罢工的高潮。一九二六年二月中旬，寿林等同志领导梧州人民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周”活动。十七日，梧州各界人民召开援助罢工大会，寿林同志在会上演说，号召各界群众全力支援，吁请政府当局对省港罢工工友，应善为爱护。大会根据寿林同志的主张，通过提案，向省港罢工工友致电声援，并将通电发各省市报馆转全国民众。大会结束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以寿林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梧州地委，全力以赴地领导梧州的工、农、妇、学群众运动，地委委员分工：周济、钟山领导梧州的工运，林培斌、黄启滔领导梧州郊区和苍梧道（包括今梧州地区南部、玉林地区和武宣等十四个县）的农民运动。各地的运动蓬勃开展，为支援北伐战争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中共梧州地委当时直接领导梧州支部，以及未有市委的桂林、柳州支部。一九二六年春以后，地委派出党员骨干林培斌、黄启滔、罗少彦、陈洪涛等同志到南宁、岑溪、容县、玉林、桂平、贵县、武宣、田东、东兰、怀集（当时属广西）等地筹建党的组织。下半年，上级指示成立中共广西

省委筹备小组，由黄日葵、谭寿林、陈勉恕三同志组成。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广西各地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

这年旧历三月，寿林曾回家探亲，耳闻目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祸害群众的罪行。他针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写了一篇《牛鬼蛇神之桥圩团局》的檄文，其中一段：“杨甫周以吹赌为生，以公款当私财，包娼包赌，年终结帐则报告消除，无人敢于清算。若莫得乎（莫德孚）柔懦自安，清闲自在；刘尧楷无非‘伴食宰相’不问朝政；更有梁郅隆确属酒囊饭袋，终日吃喝，并无满足；而李相堂俨然‘挂名提督’，奔走钻营，不过横床直竹。总之，尸位素餐，不尽其职，日则呼卢喝雉，夜则妓馆栖身，以公局当秦楼楚馆。言及办匪，则猫鼠同眠，惯匪著匪逍遥法外，善良黎庶却号哭终天。”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打倒土豪劣绅》的檄文，在乡间传播。他在家小驻的十几天中，还在三塘圩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进行演讲，号召大家起来实行“二五”减租。当地土豪刘进三想来破坏大会的进行，被谭寿林领导农民兄弟把他轰走。寿林同志还分别在谭岭村对面的唱歌岭、圣岭、大冲肚、汶泉岭、六湖村下庙岭禾屋等地召集农民开会，号召“我们穷人都应团结起来，向地主要返田”。

当时，有些乡村已组织有了农协会，还办有“平民夜读班”。寿林同志曾到夜读班教学员读书识字，唱革命歌曲。他还编有很多革命山歌给农民传唱，启发大家的觉悟。

热情如火 多谋善断

谭寿林同志在担任中共梧州地委书记和广西省委筹备小

组成员期间，既热情如火地工作，又注意运用斗争策略，不断提高领导艺术水平。他一身兼任五职（二中国文教员、民国日报社社长、宣传员养成所讲师、党内是地委书记、省委筹备小组成员），百事纷集，备极繁忙，但他有顽强的工作干劲，又科学地支配时间，终于把工作做得很出色，成为同志们的表率。

一九二六年五月，梧州发生由右派预谋构陷，警察无理扣押在北山研究工作的三个青年同志，即所谓“北山情奸案”。此事纯属右派捏造诬蔑，借以打击青年运动。当即激起了学生群众的忿怒，集队到警察局请愿，要求惩办肇事警察，并登报道歉。工人群众亦自动起来声援。寿林立即召集党团及群运负责人讨论，他认为这对当前人民的利益关系不大，不宜扩大事态。结果决定：要警察局长当面向群众道歉，立即把所扣押三人释放了事。

一九二六年夏，省立二中校长崔赞漠无理开除进步的学生领袖钟云、刘伯奎（二人均为团员、学联负责人）等，企图压制学生运动，引起了二中学潮。事发后，寿林同志即召集党、团、青运同志紧急开会，决定领导学生进行说理斗争。还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责备校长教育无方，措施失当。结果，学生无罪释放，学校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校长崔赞漠被迫辞职，斗争取得了胜利。

寿林同志在梧州坚决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大义凛然，刚强不屈。梧州码头工人凌二妹等，揭露资本家“仁生”（老板是黄绍竑兄弟）私运烟土，“仁生”老板便勾结驻梧七军六旅，无理逮捕凌二妹等三人，九月二日横加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工人血案”。事情发生后，寿林同志与地委

委员们多次研究对策，决定领导工人和广大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梧州大较场召开三万人的追悼会，控诉反动派残杀三工人的血腥暴行。不久，梧州廿五个工会一万多工人又集会，向全国发出抗议通电，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香港工团等革命团体的通电声援。当时还是国共合作，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责成广西当局调查处理。在各方压力下，反动当局被逼赔给三工人家属抚恤费。斗争胜利结束。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新上任的梧州警备司令王应榆，在警备部礼堂摆下“鸿门宴”，目的想借宴会使他的爪牙认识各革命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准备随时对革命派进行破坏和镇压。在开席前，王应榆作威胁性的发言，到会者听了他的狂吠，敢怒不敢言。寿林同志却针锋相对，严辞驳斥：“请问司令先生，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会，学生组织学会，商界组织商会，他们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开展正当的社会活动，何罪之有？你自称中山先生信徒，何竟把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置于不顾？”寿林同志的发言，极大地鼓舞在场的革命骨干，驳得王应榆无言以对，宴会不欢而散。

王应榆并不甘心于宴会上的失败，为了镇压梧州各界人民举行的反苛捐杂税斗争，于当年十二月十九日，突派大批军警，分头包围市党部、民国日报社、工代联合会等处，捏造图谋暴乱的“罪名”，逮捕了谭寿林、钟山、胡奕卿、蔡美利、李锡彤等五位同志。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尚未公开叛变革命，他们逮捕寿林等人后，还不敢立即杀害，把这五位同志关进死牢，不准说话，不准亲友探监和送衣物，百般虐待，但寿林等同志并不屈服，在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

于党组织的营救，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的责成下，梧州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九日将寿林等五位同志转解广州释放。从此，寿林同志离开了梧州。

废寝忘餐 忘我战斗

寿林同志在广州获释后，即到武汉出席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会后仍回广州进行革命活动。当年四月十五日，反动派开始在广州进行“清党”大屠杀，在白色恐怖毒雾笼罩下，寿林和陈勉恕、李省群（共青团员、原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妇女部长）等同志改名换姓，秘密租借广州东山百子路前国民大学的旧房子居住，并作为联络点。为了观察敌人的动态，打听被捕同志的消息，寿林总是太胆地一个人跑到街上了解情况。后来，由于广州形势越来越紧张，寿林和陈勉恕一起化装成商人，绕道广州湾（湛江）经玉林，于旧历五月二十七日回到家里暂避。恰遇叔母病重垂危，便于叔母丧葬后，秘密赴港转到上海。后由全国总工会（设在上海）派赴香港巡视。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后，谭寿林同志到广州肃反委员会，投入审讯文教界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起义失败后的当月下旬，他从广州市郊绕道经佛山、中山出香港，即返上海，从此使用化名覃树立。一九二八年二、三月，寿林同志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稍后，调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寿林同志在上海工作，任重事繁，经常要跑各个秘密工作点联络，听取汇报，布置任务。还要到一些基层工会指导工作，所以，常常废寝忘餐。上海的军警特务、青红帮分子

特别多，环境复杂险恶，革命人员随时有被捕杀的危险。寿林同志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既大胆镇定，又能机警、沉着应变，因此工作顺利地开展。他待人诚挚，生活俭朴，关心他人重于关心自己。有一次，他患肋膜炎，既不请假，又不肯告人，更未花钱诊治，直到一个月之久，发高烧卧床，才找了一个同乡医生看了一下，但仍照常坚持工作。病后，也不肯花钱调养，仍将生活费一半节省下来，帮助困难的同志和工友。一九二八年，寿林同志和钱瑛同志在上海结婚。婚后不到三个月，组织上要送钱瑛去莫斯科学习，寿林表示热情的支持。钱瑛在苏学习期间，他写了很多书信鼓励她。一九三一年钱瑛学习回来不久，被调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寿林同样地欢送爱人动身。他俩结婚虽有三年多，但为了革命工作，“相处仅百余天”，把爱情和幸福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寿林同志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党的干部，而且是一位英勇无畏的革命文化战士。他青年时就有较明确的文艺思想，他认为：立论为文必须有益人群；只学会写祭文、挽联之类酬世文字是不足取的。他对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对党的宣传工作和革命文学事业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他把自己的革命理想，革命热情、革命信念，凝聚在笔端，发出了吼如雷霆的革命呐喊。

谭寿林在贵县中学时主编《晨报》；在北大编辑《桂光》半月刊；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编辑《工人周刊》；在梧州负责《民国日报》；在上海担任《红旗报》的部分编辑工作。他除了搞好编辑和给各种报刊投稿外，每天必写日记；业余文艺创作了很多揭露社会黑暗的短篇小说。